

大城市的未来

柏林、伦敦、巴黎、纽约——经济方面

〔联邦德国〕汉斯·于尔根·尤尔斯

〔英国〕约翰·B·戈达德

〔联邦德国〕霍斯特·麦特查瑞斯

张秋昉等 译

著



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

大城市的未来

柏林、伦敦、巴黎、纽约——经济方面

〔联邦德国〕汉斯·于尔根·尤尔斯

〔英 国〕约翰·B·戈达德 著

〔联邦德国〕霍斯特·麦特查瑞斯

张秋舫等 译

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

Hans · Jürgen Ewers

John · B · Goddard

Horst · Matzerath

The Future of the Metropolis;

Berlin, London, Paris, New York

— Economic Aspects

Walter de Gruyter & Co. West

Berlin, 1986

本书根据西柏林格鲁特瓦尔特公司1986年版译出

《大城市的未来》

张秋舫等 译

责任编辑 赵东方

*

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和平街北口北土城 邮政编码 100029)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新源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 印张14.25 字数370千字

1991年5月 第1版 · 1991年5月 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 定价5.90元

ISBN 7—81000—459—X/F·143

中译本序

这本书是张秋舫等同志译自出版于1986年,由尤尔斯(Hans·Jürgen Ewers)、戈达德(John·B·Goddard)和麦特查瑞斯(Horst·Matzerath)共同主编的《The Future of Metropolis: Berlin, London, Paris, New York—Economic Aspects》一书的汉译本。

尤尔斯等人所编的原书,是在1984年10月提交给柏林工业大学召开的“都市的未来——经济方面问题”国际讨论会的论文基础上编纂的。主编者在前言中声明说“都市未来”这一科研项目的主要设想是以和别的都市对比的方法为柏林(西)将来的发展提出可供选择的办法。书中采用的是“案例研究”的方法;在柏林(西)外,选择伦敦、巴黎、纽约三个世界有名的都市作为“案例”;对它们的发展进行了历史、现状和未来的详细分析;企图得出,在经济若干方面,某些带有规律性的推断与论证。

本书不是一本通常作为经济学一门分支的所谓“城市经济学”。因为“都市”的词义不是一般城市,而是把中小城市都排除在外的大城市。其所说的都市的“经济方面”也并不全面地论述都市中一切有关的经济制度、组织、设施、运转等等问题,而只涉及于都市未来的新发展所带来的某些有关的经济方面的问题。

“都市”一词古已有之,虽然其古义与现代汉语中的意义不尽相同。这一词可溯源于古希腊。但在古希腊,该词的含义是“母城”(带有祖国的意思)。它指的是一个拥有若干从它分出去,成为它的“殖民地”新城市的原城市。在当时低生产水平的社会里,这种都市主要是政治中心。而今天我们所称的都市主要是指在近代工业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大城市。工业化大大提高了社会的生产力。制造工业的发展和集中,膨胀了其所在的城市,使

其从一般的中小城市变为都市。在过去一个长期的过程中，一些一般城市的都市化几乎成为历史发展的固定的趋向。甚至于到了本世纪的初年，人们对于这一趋向的长期性和继续性几乎不发生任何怀疑；都市化被认为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个标志。

但也就是在本世纪初年，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一个相反变化的趋向已经出现，工业化时期都市不断扩大、繁荣的趋势已到了转折点，代之而来者是一个分散、衰落的新趋势。到了本世纪的五十、六十年代，这趋势表现得更为明显。及至七十、八十年代，问题就到了严重的地步。西欧、北美多数的都市都面临着这一个似乎不可抗拒局面——制造业工场的关停、外迁，大量资本和人口的流失，制造业、运输业工人失业的增加，税收的减少，各种社会问题的大大增加等等。

在这种现象中，制造业的动向似乎是最明显的了。除了一些陈旧过时的工业当然应归淘汰者外，其余制造业纷纷外迁到都市的郊区、中小城市，甚至到村镇。所以一方面，都市由这些制造业的外迁，而趋于缩小衰落。另一方面，中小城市、村镇却似乎以分散的形式，在重复历史上工业化城市成长兴盛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作者们，在提及制造业从都市消失过程时，所注意的是，在一个国家之内，都市和中小城市、村镇发展趋势互换的问题——这当然是主要的，而没提到这一趋势在国际间的表现。实际上，在最近几年，某些制造工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开始并相继从高度工业化的国家转向发展中第三世界国家中输出的趋势，已构成值得引人注意的现象。

本书作者们，对于在改变过程中呈现的各种问题，作了不少的分析。这些分析也许没有提出一些系统而明确的答案，但却也指向一个共同的认识。从案例的研究中，他们一致认为：在西欧、北美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这一个近几十年中存在的都市衰落现象是这些国家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的进化的必然结果。

这一过程的动力是生产技术的进步。上述的在这些高度工业化国家所出现的现象不是一个简单萎缩过程，而是一个从传统的制造业中心向执行管理和传播职能结构中心转变的过程。都市在将来社会中将仍然占据着中心的地位，只是它们的性质和结构有所改变而已。

如果对本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作者们未能提出系统而明确的答案，则在政府政策方面，相应的计划措施更是大大落后于实际的要求。我们同意许多作者们的意见：到目前为止，各国政府没有提出制定和评价有关政策的有系统的探讨方法。对于现有都市问题的处理措施只是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和部门政策的产品。

本书不是一本教科书，它不能给读者以对于一切问题若干现成的结论、明确的建议和系统的理论。它只能是一本处于探索阶段的专题著作；它提出问题，但并不企图强求一致地提出解决的处方，但这恰恰是本书的作用和优点所在。它的作用不在于灌输某种成熟的观点而在于激发读者对于呈现在眼前的现实进行思考。

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在发展中的国家，其相关的眼前现实又是什么呢？显然，我们的现实不同于本书所涉及的高度工业化国家的现实。简单地说，我们的社会经济尚处于所谓“工业社会”的还不甚发达的阶段。我们的都市三十多年来，作为快速工业化的结果，正在经历着一个不断膨胀的过程。我们也有了一些几百万上千万人口的工业化比较集中的都市。就这一阶段的情况来说，书中所涉及的问题还不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现实。但是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都市是否会和今日西欧、北美的经历一样，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阶段呢？果其然也，则今天这些国家在这转型过程中的种种经验和教训是否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前车之鉴呢？甚至，再往上推至这些国家的城市在工业化阶段变为都市的过程中，当时似乎是适应所谓工业化社会的生活、生产的要求而作出的城市规

划、建设、设备，在今日却反而成为转型都市有待调整的问题的经验，对我们今日为未来而作的未雨绸缪，是否也不无启发的作用呢？

因此，这一本书中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对于我们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城市规划设计者、建筑师、企业家，都可能是及时的思考材料。译本的问世将会是受到欢迎的。

陈岱孙

1989年5月24日

陈岱孙教授给本书译者的信

秋舫同志：

原书粗略地翻阅了一下。是一本很值得介绍给国内的书。不巧，二星期来忙于奔走开会，而昨今两天起，又发生偏头疼。序只好一星期后再动笔了。

有一问题希望译者同志们再考虑一下。这就是书名的译文，现在的译文是“城市经济的未来”。在译文“信”的一点上，是否有可议之处？

(一) Metropolis已习惯地被译为“都市”、“都会”、“大都市”。如果一定要用城市二字，也得译为“大城市”。译为“城市”则必然要包括大、中、小等所有城市。显然这不是本书的内容所涉及者。

(二) 原书的主题是“都市的将来”。Economic aspect只算能附题，标明本书侧重于注意在将来发展的过程中所可能牵涉到的某些经济方面的问题。今译之为“城市经济的未来”，则与原题意不相符。

(三) 书名对读者是第一个冲击。如果读者认为译文的“信”有可议者，看下去的兴趣就会大大减少了。

匆此，并致

敬礼

陈岱孙

八九，五，十七。

序 言

本书把1984年10月在柏林工业大学召开的一个题目即“大城市的未来—经济方面”的国际讨论会的成果提供给更多的读者。这个讨论会是一个更广泛的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它的论题是“大城市的未来：巴黎—伦敦—纽约—柏林”，由柏林工业大学和西柏林建筑和住宅评议会发起并开展，作为对柏林国际建筑展览会的奉献。其第一部分（“报告阶段”）于1984年举行，国际建筑展览会的第二部分将在1987年继续举行，与此同时庆祝柏林的建成750周年纪念。

国际建筑展览会和750周年纪念这两件事足以使人们重新考虑一般的大城市，尤其是柏林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其它西方大城市相比，西柏林更是经历着一个急剧衰退的阶段，不论是人口方面还是就业方面，尤其是制造业的就业。除了西柏林在过去的40年和在可预知的将来所必须起的特殊的政治作用外，大城市未来的功能以及对西柏林来说这个功能的含义的这个问题出现了。关于“大城市的未来”的研究项目最主要的想法是通过与其它大城市的对比来发展西柏林未来的选择，乃至可以向永远达不到“其他条件相同”的案例学习。虽然，从可行性来考虑，这个研究项目具体例子的选择限制在伦敦、纽约和巴黎，但是，讨论涉及到了在规模和重要性上相似的其他大城市也可以观察到的广泛的一般趋势。因此，这里介绍的讨论会中广泛主题的经济方面的论文远远超出了伦敦、纽约、巴黎、柏林四个案例的研究范围。

会议讨论了他们的经济史、现存的经济问题和政治上的选择，同时对由上面所提到的例子所说明的正在进行的一般趋势进行了仔细的描述。所以这本书可为包括经济史学家、经济地理学

家、区域规划工作者、城市规划工作者和制订使他们的城市经济基础更有活力的政策的地方当局在内这些广泛的公众，提供一个目前的经济趋势和政治选择的概要。

我非常感谢帮助我使会议进行下去和使论文出版的诸多人和机构。泰尼的纽卡塞大学的约翰·戈达德和科隆的国家历史档案馆的霍斯特·麦特查瑞斯，是这个研究方案的主要顾问、两届会议的主席和这本书的合作编辑。柏林工业大学的行政主任卡尔·施瓦茨是整个项目的足智多谋的主持人，同时还是这样一项事业中发生的许多故障的检修员，这些故障包括几乎不可避免的预算的扩大。罗尔夫·斯坦因，在他的研究工作之外，承担了相当于编辑任务的为准备会议所必须做的组织工作。朱迪·利布拉为编辑许多手稿的翻译帮了很多忙。柏林建筑与住宅评议会的克劳斯·弗卡兰和柏林工业大学的副校长克劳斯·舒曼和经济学与运输评议会的前副秘书长、现任财政参议员冈特·雷克斯罗德共同任会议的主持人。预算是由柏林建筑与住宅评议会和柏林工业大学提供的。

汉斯·于尔根·尤尔斯

柏林 1986年3月

导 言

I、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工业化世界的大多数大城市已经进入某种困境，在它们当中柏林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则早二十五年就面临困境。大多数大城市在某种程度上面临着资本和人口的不断流失、制造业就业的严重下降、大量货物运输中雇工的锐减、税收基础的下降以及社会地位处于劣势的人们（失业的、移民、无技术的、少教育的、老人）占有较大数量的比例，致使社会问题引人注目地增长。虽然，在一个城市的经济中衰退的时期并非新的事情，但在过去大城市的发展中似曾存在的不可逆转的增长冲力现在将被打破。与早期偶然的倒退和减退相反，许多西方工业化国家城市的发展中，在经历着一种继续萎缩的过程，并且在许多场合成为绝对的下降。大城市危机的目前情况是：长期既定趋势的中断是它向新的功能转变的时期，还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未来下降的表现呢？在政治上处理大多数大城市的这些明显的问题应当做些什么？什么是大城市复兴战略的恰当的出发点？在经济全面衰退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有效的组织？

对于这些问题在本书中不能找到直接的答案。虽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在本书中提出的某些一般性的部分乐观的观点可以被当做初步的结论：

有充分的迹象表明大城市的可观察到的衰退，是作为从产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不断的逐步的转变中在空间上的影响。这一过程的驱动力是技术的进步，它首先创造了制造业商品大规模生产的基础，然后为制造业中的费力的体力劳动提供愈来愈多的解放。大城市曾经是并且仍然是制造业中的物质生产的建立和中止过程的领头者。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制造业的物质生产已经确

立为物质生产的中心，现在它们更有活力地正在把自己建成为技术组织知识、信息生产、分配以及传播的中心的进程中，并且通过这些成为世界范围的产业体系未来发展的领头者。

因此，现在在工业化国家的大城市中遇到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萎缩的过程，而是从传统的制造业中心向着执行管理和传播的职能结构转变的过程。正如数量分析所显示，大都市和相似大小的城市的萎缩过程主要地限于制造业部门的活动。

认识这一点是重要的，现在大城市的职能改变的过程已经较为减慢，这是由于正在进行的世界范围的萧条所造成的经济活动的全面的低水平，特别是在投资上的低水平。如果谁接受世界范围的经济活动五十到六十年为一个周期的概念的话，那么大都市的真正的飞速转变将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最初几年到来似乎是可信的，那时世界经济在基本创新的基础上得到复兴，这种创新现在已经在微电子、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等领域中可以被观察到。

由于职能改变所造成的摩擦，对于那些在19世纪中因工业制造业物质生产的高涨而特别获利的城市最受影响。这些城市承担着巨大的过时的固定资本以致根本无法考虑住宅设备、基础设施和有形资本。在这些城市中对过时的结构的恢复过程、转化和部分地废弃，是世界范围的产业体系的崛起，从而使旧的工业都市实现其新作用的必要前提条件。

形成先进的工业城市增长基础的有三种类型的活动：在工业制造业中这种生产活动是复杂的，即使是在先进的电信体系下，不论是对顾客还是对特别的研究和发展活动也需依赖面对面的接触。这也适用于复杂的投资货物以及为高收入阶层所需要的多种多样的消费货物。在服务业领域中，特别是面向生产的服务，大城市可能专业化；特别是提供给新技术诸如软件生产、租赁、市场研究、建设和计划、广告和咨询的活动。这些活动对于信息有

一种强烈的需求，因此它要依赖都市的环境。形成未来城市增长基础的第三种活动是面向家庭的服务，特别是那些便于人民观念和信息的交往的服务，诸如交通、旅游、出版、电影放映和影视艺术、娱乐和国际事务。

有利于动态都市地区增长的最重要的性能是它们对迅速上升的那些中产阶级的吸引力，他们能够动员对扮演产业体系的非常规的功能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如高技术的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信息中介人。这些中产阶级喜欢都市环境的有利之处，但是不能接受工业化城市在住宅、环境条件以及交通拥挤方面的传统缺陷。

另一方面，老的工业城市在工作场地的需求和供给上进入了一种正在增长的质量上的不平衡。这种城市作为农村来的无技术移民乐于充当低水平雇工的场所发展起来的。并且至时今日，这些城市仍吸引着许多没有技术的移民。可是初级水平的工作场所正在随着传统的经营、低质量的职员和体力职业的萎缩而萎缩。虽然，正和过去一样，大都市的经济将会创造许多低技术的职业，特别是在面向家庭的服务部门中，这些职业将会被愿意接受中等的工作条件和低收入职业的不断增多的新的移民所接受，但却不被城市里现存的具有不同职业期望的失业者所接受。

同这种情况有关的、明确的城市经济发展政策却难以发展。政府的反应仅仅是现在才出现，不幸的是在绝大多数场合是作为特定危机的处理方式而出现。所需要的不仅是一种新的作为手段的探讨，而且也是一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责任之间的新分工。

从手段上说，在萧条地区主要通过补充投资来刺激经济活力的传统说法特别是由于以下两个理由而已经成为问题：第一，由于在经济停滞的条件下机动投资的可能性太小，以致不能对经济萧条的城市复兴提供一个有效的出发点，人们不再相信以灵活性为

方向对地区政策探讨的有效性。集中本地的潜力和刺激它的发展似乎是更有指望的。第二，投资的诱因通常是偏好于传统的生产活动，因此它将导致不合需要的结构方面的结果，而不是大城市的必要的功能转变。另一方面，正如前面已经叙述过的，新出现的都市工业更多地依赖于适当的都市环境，即信息的可用性、高质量的劳动、研究和发展的便利，而不是单纯的成本优势。因此，刺激都市地区内在潜力的政策，必须集中在创造所需要的工业环境。

从制度上说，变化中的有效管理要求特别是在大城市里扩大地方一级的积极性。一方面，这些城市必须为新出现的高技术产业提供温床的功能。另一方面，它们必须解决上述许多摩擦问题，这些问题是随着从一个工业社会到一个信息社会的转变以及价值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而来的，它的冲击首先在大城市中感觉到。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不能仅仅从增加技术上的竞争力和生产力的狭隘观点来观察经济的发展，而必须同时包括生态的、社会的和文化等事物。此外，还必须寻求对付新形式贫困的适当方法以及社会结合和合作的新途径。因此，必须创造一种新的都市干涉主义，而且要得到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以便有效地对付一批史无前例的都市问题。

在以下的各节里，将简单描述本书中的各篇论文。本书的粗略的大纲展示出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首先是历史的探讨，继之以当前情况的经济分析，最后是对现存都市政策的估价的尝试和新城市复兴战略正确出发点的特征。本书这三部分，都包括在本书选择作为例子的柏林、伦敦、纽约和巴黎四个城市的综合比较观察以及特别提供的材料。

I、本书第一部分主要以历史为导向。它的基本问题是如何解释当前大城市觉察到的危机。或者通过对单个城市事例的分析，或者对这些领头的城市进行综合的比较分析。虽然，这些例

子的选择毫无疑问将显示这些都市发展的相似之处，然而这些都市由于在地理位置上的差异以及它们的政治经济和背景的差异，它们有着不同时间上的不同的上升。因此，对于大城市的出现和它过去的发展，用一个统一的结构只能在一个非常有限的方面作出解释。

柏林在1850年前后的主要工业化浪潮时的起飞到1928年的大柏林法案的这段时间里，显示出在普鲁士和随后德意志的首都上升为一个工业的大城市的基本要素：交通联系网络特别是铁路系统的中心位置；制造业生产技术创新部门的地点设立；较高级公共、私人管理和服务功能的集中以及主要形成资本的财产和合格劳动的大量供给的便利。

同柏林形成对照的是巴黎，巴黎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首都，曾经是它的民族国家城市体系中的支配城市。本书第一部分说明了从19世纪早期到现在在经济发展和中央计划活动的影响之间的关系。巴黎从19世纪初已经是贸易和金融的中心，巴黎又在它自己的地区内进一步集中了经济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功能。大规模的工业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人人口在1890年以后特别在郊区广泛增长起来。非工业的趋势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它表现为迫使基层活动转移到巴黎地区的边缘，甚至超出巴黎地区，并且进一步将高级服务功能如管理、研究、发展、计划和市场等集中在城市中心。这种趋势随着80年代主要影响物质生产活动的经济危机而更为加强了。

大都市经过一长时期的上升和衰退，纽约的事例是有代表性的，书中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并完全证明了大都市的未来特征。例如：位置上的有利，它扮演世界范围的产业体系的管理功能。自从1625——1626年新阿姆斯特丹（即纽约）建立以来，纽约城市的经济和社会性质已有六次以上的改变：殖民地的创立；不列颠帝国的省会和商业中心；独立以后上升为大城市 and 银行

中心；19世纪后半期美国的贸易和金融中心以及最大的工业城市；在本世纪上半期其作为资本市场、贸易中心和工业地点功能的扩展；二次大战以后工业、贸易和航运的衰落；1977年以来纽约经济的恢复。在这个发展中，纽约迅速同它的地方和国家的结构作用相脱离，已经在国际化的产业体系中，特别是在有关金融和贸易方面取得特殊的功能。这个发展使纽约成为世界贸易的首都，并且因此使它重新接近作为贸易场所的起点。

本书还将伦敦、巴黎、纽约和柏林的发展放在大城市上升的复杂结构中分析大城市的升起，加上它的固有的服务部门的协调功能，就为民族国家的兴起积累了生产活力和政治功能。书中认为，这种转折点是在1900年前后，那时分权化的倾向很强烈，而且晚期资本主义日益增多的问题迫使试图对进一步的发展进行计划和控制。随着计划方法的失效和经济危机而来的是大城市的资本和人口的飞速增长以及不断增长的社会问题，这些在1970年前后形成一种大城市危机的观点。书中认为，虽然在经济发展的长期波动中大城市的局面被周期性衰退所恶化，但当前大城市的情况仍属一种过渡阶段。书中预见大城市的变化为：较不密集，再生产的中心超过生产的中心，较好的政府前提条件，先进的面向生产的服务，文化、教育和闲暇活动。因此，现代大城市将执行与前工业社会的都市相类似的功能，并且在某种情况下回到它的起始状态。

书中还描述了大城市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90—1914年前后，这是使得大城市成为真正的工业城市的经济转变时期，第二阶段是大约一百年以后，大城市导入了非工业化的过程。书中对大城市发展过程的理解是借助于被一系列的创新所触发的经济发展中长期波动的概念。在过去推动着经济发展长期波动的创新主要是在生产上被导入的，现在的创新则主要是在信息上。照书中的说法，大城市将继续是创新的中心，不过它们的

影响范围将既扩大到它们的直接腹地，又扩大到它们的国际规模的活动。除了因过去有这种差别之外，书中指出以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或威廉姆时代的柏林为一方，以硅谷或不列颠M4号通路为另一方，它们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它们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在科学和技术创新形式上的鼓励以及军事合同的刺激。可见，推动过去城市发展的力量同推动今日城市发展的力量是没有很大区别的，已经改变了的一切只不过是有关活动在地理上的展开而已。

Ⅱ、本书的第二部分是从一特定的经济观点来分析最近数十年内城市和城市体系的发展。在第一章中，当前出现的人口和就业分配的变化趋势被提了出来，对解释这些情况的各种理论也进行了探讨，从而未来的可能趋势被显示出来。书中对欧洲城市制度的演变用广泛存在的城市发展阶段的各种理论来进行分析，并且比较了不同国家和不同形式的城市人口变化模式。从而这些分类是与城市变化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联系起来的。它表示出柏林的人口统计和工业发展并不像通常所设想的是一种例外，特别是如果把它与其他北方首都城市相比较的话。

书中也开始用与城市化水平的增长成为负相关的就业率变化为手段，来探讨城市化了的欧洲地区制造业的下降。他特别从英国都市地区的工业活动变化和人口变化的观察为对比，来评论当前试图解释这些过程的各种理论。即便是在“高技术工业部门”中，最高的增长率并不是发生在大工业集团的范围之内，而是在它的毗邻地区，它既是高度地环绕于中心地区，并且也是与有利的环境条件有距离的。然而，他对旧的城市地区的发展条件的判断是“谨慎的乐观主义”的，因为它们将继续作为多元活动的中心。

描绘结构性经济变化的传统部门的分析方法，是作为在一个部门或地区中进行活动的不同型的分析基础。功能上分工结局